



## 第十三章

## 前夜

經由南京，我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被調到廣州天河機場，民國三十八年八月離開，我把在廣州這八個多月的日子定名為「前夜」，是什麼的前夜呢？是革命的前夜？是大逃亡的前夜？是時代巨變的前夜？還是，我自己對人生所做的最重要一次抉擇的前夜呢？都算對吧。

像廣州這樣的城市，用不著想像力，它本身就有背景音樂，自然是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宿舍裏街市上處處皆有。有一首吳鶯音唱的「不再相見」，歌詞大約是：

不再相見，

不再相見。

往事如雲煙，

相思年年。

郎情縱然似水，妾已不復當年。

不再相見，不再相見……

歌聲淒切婉轉，似預示著什麼，對我這個自幼唱「大刀向」長大的青年來說，「靡靡之音」不屑一聽，但流行歌曲在廣州已是如影隨形，況且「不再相見」不止是流行歌曲，如同另一首「黃葉舞秋

風」，似在預示著什麼事情的來臨。

街市上明顯地也有前夜的徵兆，書攤上賣的是「推背圖」，「燒餅歌」兩種小冊子，要和我年齡相若的人才知道這兩本書的意義，它們流傳百年甚至傳說一千年了，用模稜兩可的簡單語句，給人們解釋時代變遷時內心的不確定感，有人用它暫時穩定住焦慮的情緒，也算是心理治療的方式之一。

不知道是誰說的：「人是經濟的動物。」這句話的真正意義我不十分清楚，但在廣州的「前夜」時期，有許多事實可以印證一件事，人有一種獵犬般的嗅覺，聞得出可以撈到錢的空間，有了，絕不放棄機會。大變動之前許久，警察好像都休假了，街上可以要賣什麼就賣什麼，除了「續餅歌」，「推背圖」之外，還有人印製各種色情小說。那時印刷條件差，像如今的A片拍不出來，連Play boy的裸女圖片也看不到，但是有文字的，什麼肉蒲園啦，金瓶梅精彩本啦，被稱為中國五四以後的性學大師張競生寫的小江平也是那時看到的，其他由「作家」們臨時趕工的「小說」也不少，不知道這些人在短短的幾個月中能夠賺到多少錢。最妙的是到了三十八年夏季，連正式的賭場也開張了，裏面有牌九桌，骰子桌，設備豪華，限用港幣或銀元，不收金圓卷。也不知九月底共軍進城前，他們能撈回成本否？

廣州最忙碌的商店街叫做「上下九」，全是金店，當時則以買賣港幣或大頭(即銀元)成為主要交易。我們那時的月薪約為每月底發放，管總務的每個月都要被大家罵一次，他是二十九號發還是三十號發，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大的差異，我們發的是金圓卷，金圓當然值得一談，但若無馬定祥先生，則我所談金圓卷的內容便很貧乏了。

馬定祥士官長是我在廣州期間來往最密切的人，我們當然也有同學，而且有兩位，一位的名字忘了，另一位是花子儀，原來我們在學校時的關係很不錯的，他也很有趣。

我會問他，花姓很少見，是花木蘭的後代嗎？他用字正腔圓的四川話說，花木蘭是個女的，嫁人生了孩子也不姓花，「我如何會是花木蘭的後代呢？」問他的名字「子儀」不是和唐期的郭子儀一樣嗎？他笑著回答：「有何不可？」因為四川人談話喜歡用「名堂」兩字，我就學四川口音說：「你哥子無論是姓還是名，都有些名堂呢，以後就叫你『花名堂』好不？」他也笑著回答：「有何不可？」這花名堂就在同學中叫開了。可到了廣州一看，人家有了太太，且兒子也長得很高了，不好意思再以四川話開他玩笑，他反而問我：「再叫嘛，有何不可？」畢竟人家有了家小，我很少找他去談天。另一位同學姓劉，名字真地忘了，後來搭由台北赴花蓮的飛機赴調，飛機

摔在山中，約為民國四十三、四年間的事，軍機摔了，報紙都不會登。

因此，在廣州我和士官長馬定祥來往最多，去街上換港幣，談天，最重要的是借書。他的床舖底下堆了一堆的「觀察」周刊，算是當時的「民主」刊物，(那時「民主」的定義是指反對國民政府)，不像如今刊物般地八卦或如此具有攻擊性，執筆者多為大學教授級的人。是在馬定祥過期的觀察周刊上，讀到馬寅初教授(1882-1982)早在金圓卷發行後不久，談此問題的一篇文章，由馬教授的文章可以看出經濟學的道理也可以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寫出來。(馬寅初後來因為反對毛澤東的「人多好辦事」政策，被狠狠地鬥爭過。)

金圓卷可能是民國三十七年下半年以後實行的，那時我尚在北平。好像通令了全國，凡家中持有銀元、金飾、金塊者一律換成金圓卷，違者嚴處，別人家如何不知道，我爺爺他們一家，就把他們壓箱底的銀元金飾傾囊而出，換成金圓卷了，當時北平的報紙上還刊出一位滿清時代的王爺，把家傳的大金印拿出換金圓卷，還有金印被切成兩半以判成份的照片。

馬寅初的文章上說，金圓卷注定要失敗，他說如今國家面臨的問題，是民生物質缺乏和通貨膨脹，政府提出把法幣按一定面值換成金圓卷流通，基本上不會解決問題。但如今又規定，持有金飾或

銀元者必須換成金圓卷，如此，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了。

夫貨幣者，是勞力或貨物的代替品，不會因為叫做「法幣」或「金圓卷」而有所不同。除非由金飾或銀元兌出的金圓卷，都如同本來的金飾或銀元一樣存放著，或正式存在銀行中生息，否則流通在市面上，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不是增加了嗎？貨幣量增加了，必然結果是物價上漲，而偏偏政府又規定自金圓卷實施之日起，民生物質不准調價。想用這樣的方法穩定物價，豈非緣木求魚？

不知道蔣經國看過這篇文章沒有？這應不是深奧難懂的經濟理論，最少也有幕僚講給他聽吧。那時，三十七年年底除了國軍節節敗退之外，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成為第二大的新聞。他找了幾個倒霉的有錢人，以囤積居奇的罪名抓起來。同一時間，報載南京發生搶米事件，金圓卷幣值天天跌，小商人今天賣了，說不定明天用賣出的金圓卷還買不回同樣的米，他們只好關著門不賣了，誰知被人知道，聚眾敲破大門入內一搶而空。

至今，我仍懷疑金圓卷根本就是一場騙局。後來政府在台灣發行新台幣，每月都在報紙上登廣告，請有名望的為「監察人」，監察人證明發行額若干若干萬元，庫存黃金、白銀若干若干萬兩，若非曾做過虧心事，何必出此下策？政府，只需管住你的印鈔機就夠

了。

還是回到廣州天河機場。我們每月底一拿到金圓卷，立刻趕去「上下九」換港幣，大概銀元已經換不到幾粒，換港幣可換成十元，五元或一元多種。留了港幣又做什麼用呢？實在太少，只能補貼我們實在太差的伙食，我這人只要有饅頭便可填飽肚子，廣州是吃米飯，發的軍米又是很差勁的那種，飯鍋打開來不是飯香，而是一股臭溝水的氣味，菜呢？更別提了。

前面說過，人是經濟的動物，在任何環境下都有人用盡心眼發點小財。我們每到開飯的時候，便有兩位也是穿著軍服的，來賣滷豆腐干或滷五花肉，他們自稱是免費坐火車到湖南省買回來的豬肉，才能這麼便宜，新鮮度可想而知。我總是耐不住，要把最後一張的十元港幣換開，這也不是天天都吃得起，且他們只做了一陣子，以後猜不出什麼原因，不再出現了。想不到當了空軍軍官，反而有好幾個月，天天都在半饑餓狀態。

民國三十八年的有一天，忘了月、日，突然每人發了二十個或稍多或稍少一些的銀元，此乃我自空軍畢業後，第一次賺到的「大錢」。我立刻赴「上下九」把一半或更多的銀元換成了金圓卷匯到寶雞去，這是我一生中僅有一次孝敬父母親的機會，其餘的銀元當然是被我吃掉了。

士官長馬定祥是另一個李毓霖，那時多的是李毓霖。文化界人士相信共產黨的，比相信我們政府的多了幾十倍，此話有嚴重語病，應該說對民國政府失望的知識份子，比猶懷有好感者多了很多倍。馬定祥對我的開導是直接的，告訴我國民政府不久就要垮了，廣州被解放是遲早的事，國民政府很可能逃到台灣去，但台灣也避免不了被解放的命運，他的話我全都相信，但他一直沒有提醒我應該存一點錢。

廣州和鳳翔時不一樣，在鳳翔我根本沒有零用錢，但走在街上誘惑也不大。半饑餓狀態中的我，那禁得起廣州大都會的食物釣餌？廣州是一個繁華且跡近奢華的大都會，珠江沿岸的長堤一帶，有仰之彌高的摩天樓，珠江上有後來被國民黨軍人撤退時，炸掉的珠海大橋，街上有成排成排的酒樓，大部份酒樓都把烤乳豬、烤鴨、叉燒之類食品掛在大門口，從旁邊走過均會聞到香味，即使我發了大頭的那個月，也沒有捨得剝一塊烤乳豬嚐嚐。記憶中飲過一兩次茶，和如今香港或台北廣東飲茶方式不同，茶店只供應茶，另有推車挑担者來賣點心，先問了點心的價錢再買。當然有高尚的飲茶餐廳吧，祇是我沒有去過。

就這樣省著省著，褲袋中依舊空空如也。

三十八年八月中旬某日，我們奉到命令次日飛機飛台灣，這當

然是件大事，和從北平飛南京調廣州不一樣。這應該是一次理智的抉擇，是跟著腐敗的國民政府繼續逃亡，還是選擇投奔「人民救星」的解放軍，以完成自幼培養出來的救民的心願？我的選擇很明顯很明白，但是問題仍然有，而且很大，此即人類最原始的需求.....吃飯。

報紙上說，政府有決心，共軍在雙十節以前不會打到廣州。早在四個月前共軍已經度過長江向南方進軍了，如果我留下來不跟著團體走，萬一真熬到了雙十節，這兩個月我吃什麼？其他同事和同學大部份決定遵照命令撤台灣，包括花子儀他們一家子。馬定祥是早就決定等待解放的，我能找他商量關於我吃飯的問題嗎？

前夜。

廣州八月的夜晚，氣溫高，濕度大，是人類感覺中最不舒適的天氣型態。我獨自在我們氣象台那座小樓的牆跟，席地靠牆坐下來，不時得伸手拍打叮人的蚊子，或其他不知名的小蟲。仰望天空，那時大都市的空氣污染也不嚴重，可以看到藍天和星星，可惜除了北斗七星以外，其他星星都不認識。夜，就這樣逐漸深去，寢室裏的收音機一一關了，斷腸紅、夜上海、不再相見等靡靡之音從空氣中消失。我竟然看見一顆流星，閃得很快很快，幾乎懷疑是眼睛花了，抑或真地出現？那時我尚不知道可以對流星許願的，多遺

憾！因為我真有一個願望，我想看見她，在我最困惑的時候，她都出現過，今夜她也該出現才是。

我面臨的原本是理性的問題，對與錯之間的選擇，幾乎是用不著選擇的選擇，而我目前想到的卻是動物本能需求的考驗了。我回想起寶雞大雪之夜凍死的一對父子乞丐，他們選擇離鄉背景到遠方去，是不是選錯了方向？若真挨到十月，馬定祥他會幫我找飯吃嗎？伙食團都散了，連伙伙都在打包他們的煮飯傢俱，我投奔何方呢？

那夜，她沒有出現，很晚很晚都沒有出現。我回到寢室時他們都睡了，每個人床前放著綑好的衣箱等物。我也沒有什麼衣物，除了行李捲之外，只有三大本在北平買的中華書局的辭海，一本沒有主人的魯迅寫的「兩地書」算是我的了，還有一些「朝花夕拾」之類的薄本書……

我站在床頭，在黑暗中，腳一躁，心一橫，對自己說：「去吧，遵從動物本能跟著食物走，反正只有早解放、晚解放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總比要飯好！」

就這樣，我到了台灣。

……閱讀第十四章……